

特约主持人：余小波（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为发挥理论先导作用，助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湖南大学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高层论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予以专题报道。2018年12月22日至24日举办的第五届“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高层论坛”采用专家主题发言、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来自全国高等教育界20多位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应《大学教育科学》之约，现将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整理成笔谈予以刊登，以期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 笔谈：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

摘要：重视本科教育、注重质量提升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趋势。高校办学的质量与高校内部管理密不可分。我国高校的内部治理制度和机制，主要是采用“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方式，这与学术文化、一流大学的学术价值以及推进内涵式发展的大学理念相背离。不同层次高校应该有更明确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要进一步加强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采取有力举措促进本科教育特色发展。专业教育质量是大学办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学生为本、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OBE理念可以成为推动高校专业教育质量提升的思想、制度和文化力量。高校办学质量应体现在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上。教师评价模式的选择应基于教师不同的专业水平，发展性功能才是教师评价的首要目标。“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应该从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度、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度、学校对学生学习的支持度和学生的学习获得度等四个维度去设定。应密切关注学生课堂行为，学生在课堂上的座位选择、提问与回答以及非听课行为等都会影响教学质量。大学排名备受全社会关注，也给大学造成了压力，但这种压力并不源自排名，其实质上来自于大学为了获取更多资源或者维持原有资源状况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大学理所当然不应追求排名位次，但无疑应当关注办学绩效和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教育评价；绩效管理；工分制；教师考核；本科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大学排名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2-0004-17

## 走出“工分制”管理模式下的质量保障

邬大光

在观念上，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被拔得很高，如生命线、永恒的主题、最高的追求等。可到底什么是质量保障？它的内涵是什么？标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说不清。因此，我经常说，难道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一个“道可道，不可道，名可名，非可名”的话题吗？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向全球昭告：21世纪将是由数量向质量

的转移并更加注重质量的世纪，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我国恰恰是从1999年开始扩充数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众多问题包括质量问题上与世界高等教育有一个时间差。马丁·特罗1973年就写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他对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判断，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马后炮”，但是它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马前课”。而我们只看到了这些理论在西方成功的

收稿日期：2019-02-12

作者简介：邬大光（1957-），男，辽宁锦州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厦门，361005。

结果,没有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实践当中,怎么避免“马后炮”与“马前课”这样一种矛盾的产生?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不是全部适用于中国,我们不应该全部照搬,但是它应该成为一种预警的理论。重视教育质量是一个时代的命题,而且是永恒的命题,谁轻视质量,谁就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谁就将被淘汰出局。

就高等教育质量这个话题来讲,我认为中国和国外的高等教育有理念上的时间差、管理水平上的时间差、制度上的时间差、机制上的时间差和技术上的时间差。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满打满算就是100多年,西方高等教育的历史已有近千年,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时间差。我们首先要承认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发展水平、成熟水平和世界的成熟大学相比还不在于一个层面上。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众多问题上,中国的大学同样会有众多的时间差,这是由于中国的大学办学历史、发展水平、体制不同。但是,要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保障水平,一定要找到这个时间差,找到学校质量问题的核心所在。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外延和内涵都比较宽泛,对高等教育质量概念截取的“横断面”不一样,那么对概念的理解以及外延和内涵的把握就不一样。我讲的这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宏观层面的,它不是人才培养质量,不是课堂教学质量,也不是教学质量,而可理解为大学的整体管理水平和办学水平的质量,包括育人、科研、社会服务等。大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内部的管理水平,即当下人们称之为的内部治理问题。说到底,提高大学的内部治理水平,就是提高大学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整体的质量保障。

当前,我国大学的内部治理制度和机制,主要是采用绩效管理的方式,即被人们称之为“工分制”的管理方式。在我国社会组织机构当中,什么组织最经常使用“工分制”?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当年的“生产队”。我曾经插过队,当过知青,对生产队的“工分制”非常熟悉。我们今天与会的学者,有来自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那我问一下:哪所高校没有采用绩效管理的方式?哪所高校没有采用“工分制”的管理方式?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除了中国的大

学之外,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有没有使用这种“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方式?答案显而易见。因此,我的结论是:在当前创建“双一流”的进程中,如果我们的大学内部治理依然采用基于生产队“工分制”的管理模式,是难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因为,大学的内部管理分为三个层次:一流大学的管理依靠学术文化;二流大学的管理依靠制度,如绩效管理制度,但不是生产队的“工分制”;三流大学的管理依靠行政权力。在今天,我国高校的学术权力正在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学术权力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基于“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方式是典型的“第一代大学”的发展特征,是大学不成熟的表现。理由如下:

第一,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30年代泰勒的管理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现在,西方企业已经很少使用绩效管理,即使依然在采用绩效管理,其使用的方法和范畴与我国大学的绩效管理完全是两回事。可是,我们的大学普遍还在用“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且使用到了极致,已经成为世界大学治理的一个“奇葩”。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组织,大学使用的管理理论应超前于企业的管理理论。如果大学继续使用“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方式,只能证明我们的大学正在丧失引领社会的作用,并且在管理的起点上已处于落后状态。

第二,泰勒的绩效管理理论有一个基本命题,它的内涵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经济人”来看待。也就是说,大学里的学者都被当成“经济人”看待了。我们都很清楚,在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中,“经济人”假设是第一代管理理论,“社会人”假设是第二代管理理论,“文化人”假设是第三代管理理论。大学教师是“学术人”即文化人的职业,为什么不用文化人的管理理论来治理大学呢?应该承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在大学中实施“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教师工作量的衡量。但是,把学者当成“经济人”,其逻辑起点是错误的。学术组织有其特殊性,大学的活动有其特殊性,尤其是与人才培养紧密相关的教学活动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教学活动的成本投入和成果产出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大学的活动,尤其是人才培养的活动当成商品去换算。当下,在国内大学当中,几乎大多数教师的工作量都是用“工分”来确定,并以此

来确定薪酬。

第三,绩效管理有其适用性,但这个适用性是在特定阶段具有适用性。可以说,绩效管理在学术组织中的适用性是最低的。现在已无从考证,国内是哪一所高校最早开始使用“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也无法知晓,第一个使用“工分制”的大学走到今天,其学术生产力和管理效率提高的程度如何。显然,“工分制”就像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一样,在今天似乎已经难以持续,其“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在大学发展的特定阶段,

“工分制”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是不可持续的,长期坚持反而会对学术生态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以“工分制”为主要参考的标准体系中,国内很多大学出现了学术不端的行为,就是一个佐证。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四,绩效管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同质化,它要求大学老师和大学的所有活动都采取无差别的标准和规范,对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自主性产生很大的阻碍。“工分制”自进入大学以来,一直以“双刃剑”的形式存在,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实际上,从表面来看,“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使大学的管理日益精细化、专业化,但是,指标性的管理催生了一系列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虽然这种绩效理论在企业当中有成功的案例,但是从西方的研究来看,没有查到有关绩效管理理论直接促进大学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的研究成果。

第五,提升大学办学水平和质量,需要各种激励政策和手段,但学术激励应当建立在学术理想的追求之上,更多的应该是精神层面的刺激。我最近采访了一些大学校长,在跟这些校长访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派,两派所持的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一种观点认为,在没有绩效评估的前提之下,中国的大学和学者没有动力去做学术,他们提倡使用绩效管理的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起初,“工分制”的绩效评估很有效,但到后面,这种刺激的边际效用就越来越低,但目前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取代“工分制”。第二种看法告诉我们:“工分制”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的“路径依赖”。在当前“双一流”建设与评估背景之下,每个学校都想要得到“质量”提升,尤其是“排名”

的提升,单纯靠精神层面的刺激远远不够,只能依靠“工分制”。在“工分制”的效用不断降低的背景下,很多学校就想到了人才引进的方法,想通过“人海战术”来实现绩效的增加。当前高校间的“人才大战”,其实是“工分制”的衍生现象。

第六,“工分制”的管理方式给人才培养带来了极大冲击,甚至可以说是“破坏性”冲击。在任何学校的“工分制”中,教学的“工分”都是最少的,其“含金量”也是最低的。当下人才培养和教学遇到的一系列困境,都是“工分制”造成的后果。以至于可以说,现行的“工分制”不取消,或者现行“工分制”对教学工作的“歧视”问题不解决,本科教学工作将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因为,在“工分制”面前,任何重视本科教育的举措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与会的各位学者都是教育学“圈子”里的人,各位所在的学校,给本科生讲授一门课与在《教育研究》上发一篇论文相比,是同样的“工分”吗?是相同的“含金量”吗?

说到底,“工分制”的管理模式,就是生产队的管理模式。大学不是生产队,大学不应采用生产队的管理办法。已经有学者明确指出:“生产队管理模式有三个特点:(1)记工分,(2)无效劳动,(3)缺乏自由(市场)。”过去的“生产队”管理模式,农民是直接受害者;大学实行的“工分制”,教师也正在成为受害者。“工分制”是第一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如果延续到大学中来,也可以说我们的大学正处在“第一代农民”的管理模式。昔日的中国农村改革是从破除“生产队”模式开始的,也就是实施了通常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继续破除这些“非农村领域”中存在的生产队模式,应该是当下大学必须思考的话题。

“工分制”的管理模式与学术文化相背离,与一流大学的学术价值相背离,与推进内涵式发展的大学理念相背离。说句严重的话:“工分制”有点儿像毒品,一经染上,就难以戒掉,它是一种“路径依赖”。诚如教育部长所言:“去掉四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现在,身在“工分制”模式中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了这个模式的受益者,已经没有意愿去改变它。

不容否认,绩效考核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在对“绩”的定量分析和对“效”的定性分析基础上得



出一般性结论,具有一定说服力。但从本质上而言,目前高校普遍推行的“工分制”,严重曲解了高校质量保障的内涵,甚至玷污了大学质量的精神。“工分制”,既混淆了大学的质量标准,也混淆了大学的认知标准,更混淆了大学的价值标准,尤其是混淆了大学的价值标准,十分可怕。大学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当中代表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

取向。在社会的正常情况下,人的价值判断是多重结构的,有多个维度。有理论判断,有实践判断,有理性判断,有感性判断,有应用判断,有价值判断。当这些价值判断成为一个“标准化”的磨具,且以“工分制”作为一个“刚性”手段的时候,必然引起大学价值取向的混乱,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一定会成为大学和大学人面临的重大风险。

## 基于学生课堂行为的教学质量影响因素

胡建华

21世纪以来,我国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与保障的发展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由注重外部向注重内部发展,即教学质量保障有一个从注重外部到注重内部的变化过程。开始时教学质量保障比较关注外部的教学环境、教学投入等条件,现在更加关注教学质量的内部因素。第二,由注重条件向注重过程发展。过去教学质量评估更加关注外部的条件,譬如学校对教学工作的投入、图书拥有数量、教室的面积等,现在更倾向内部过程,即培养方案制定、教师备课、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第三,由注重投入向注重结果发展。在过去,本科教学质量保障更加注重投入,主要是经费投入,还有教师教学、学校制度的投入等,而现在更看重作为结果的教学质量,尤其是体现在学生身上的学习结果。第四,由注重教师向注重学生发展。近年来,本科教学质量保障更加关注学生通过教学获得了什么。当然,教师投入也非常重要,但现在学生的获得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是高教司提出要实施基于学生结果的教学改革。第五,由注重课程向注重课堂发展。我国本科教学质量保障首先从教学计划的安排、课程的设置开始,这是我国本科教学的传统与制度所决定的。但是,教学质量最终要体现在

课堂上,教师在课堂上怎么教,学生在课堂上怎么学,要通过课堂教学看看学生究竟获得了什么。

以上是对我国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发展的一点认识。基于此,探究学生课堂行为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毫无疑问,课堂上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都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影响。在此,我试图通过一个关于学生课堂行为的小规模调查<sup>①</sup>,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生的哪些课堂行为影响教学质量,学生课堂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课堂行为与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

### 一、哪些课堂行为影响教学质量

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多种多样,根据行为的性质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例如,依据与学习是否相关,可以有学习行为与非学习行为之分;依据对教学的影响性质,又可以有积极课堂行为与消极课堂行为之分。以下所展示的调查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学生的哪些课堂行为对教学质量产生了影响。

#### (一)教室座位选择

在大学的课堂上,如果不是事先特定安排,选择座位应该是学生进入教室后的最初课堂行为。我

作者简介:胡建华(1955-),男,江苏新沂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江苏,210097。

①本文所采用的调查数据资料均出自笔者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大学生课堂消极行为调查研究》,作者为程辰。

们可以将教室的座位按照空间分割为几个区域(如图1所示),B区和E区为面向讲台的中心区域,围绕着中心区域的A、D、G、H、I、F、C构成一个“U型”区。调查数据显示,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座位的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表1所示,成绩中等以上的学生中,选择坐在B和E中心区域的有60.5%,选择坐在U型区域的为38.9%;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成绩中等以下的学生中,选择坐在B和E中心区域的只有33.9%,而选择坐在U型区域的达到66.1%。如果从座位前、后排的分区来看,成绩中等以上的学生选择前排座位的有45.1%,选择后排座位的仅有7%。成绩中等以下的学生选择后排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生。



图1 教室座位分区示意图

表1 不同成绩学生的座位选择(单位: %)

区域 成绩	B+E	U型区	前排	后排
中等以上	60.5	38.9	45.1	7
中 等	49.6	50.3	34	12.5
中等以下	33.9	66.1	23.1	26.8

## (二) 提问与回答

我国大学课堂上学生的沉默,即不太主动提出问题、也不积极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是常见的现象,也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调查数据在这方面展示了相同的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课堂上有疑问时,有63.4%的大学生选择“从不提问”或“偶尔提问”,经常向老师提问的人数远低于不太提问的人数。课堂上经常主动回答老师提问的大学生占总体的24.9%,也远低于不太主动的人数。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习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在知识掌握与能力培养方面的情况,两者都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表征。

## (三) 课堂上的非听课行为

在课堂上,一般来说,是否集中精力听课与教学质量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不认真听课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之一。学生的不听课行为有些是个体性的,有些是群体性的,后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同学在课堂上都有过具有传染性的不听课行为,包括与同学聊天、睡觉、玩手机、吃东西等。在课堂上看与课堂教学内容不相关的考证资料、发呆等非传染性不听课行为,在许多同学身上也时有发生。

## 二、学生课堂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

上述可能对教学质量产生消极作用的学生课堂行为的产生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归纳起来,无外乎学生自身的因素与外部因素两大类。

### (一) 学生自身的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学生课堂行为(尤其是消极课堂行为)的产生有许多内部因素的作用,其中“缺乏兴趣”占34.2%，“与结果无关”占19.0%，“走神”占18.5%，“学习习惯”占13.6%，“其他事情”占14.8%。缺乏兴趣或许是学生课堂消极行为产生的最主要的内部因素之一。所谓缺乏兴趣,即学生对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对教师的讲课、对所学专业、甚至对学习本身都缺少应有的兴趣,这直接导致了一些课堂消极行为的产生,其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可想而知。

### (二) 外部因素

影响学生课堂行为的外部因素,主要指课程、教师、课堂氛围、教室环境等。调查选择了课程性质、课堂规模、课堂纪律这几个维度。

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认为课程性质对学生的课堂行为产生影响。大学的课程体系是由许多不同性质的课程所构成的,如必修课与选修课,专业课与公共课等。常识告诉我们,学生一般更加注重专业课。因此,在一些公共课上,学生消极课堂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更大。这对公共课的改革与质量提升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有49.8%的学生认为课堂规模对学生的课堂行为有影响。大教室、多人数、教师上课需要扩音器,这是当下许多大学课堂教学中常见的景象,二三百人的大课堂也不鲜见。在大规模、超大规模的课堂中,学生的消极课堂行为是容易产生的。因此,许多高校都在教学改革中积极推行小班课堂,尤其是给新生开小班研讨课,这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积极课堂行为的重要途径。

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约三分之二认为课堂纪律对学生课堂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严格的课堂纪律可以消除部分学生的消极课堂行为。

总的来说,课堂是大学生学习的主战场。尽管现

在大学生的学习形式有课内学习、校外学习、社会实践、课外活动等,但课堂仍然是学生学习的主要阵地。学科专业知识要通过课堂来传授,能力、素质的培养需要在课堂上进行,所以,应下大气力切实保障课堂质量,向课堂要质量。

课堂质量的保障,主要涉及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调动学生课堂上的学习积极性,对学生的消极课堂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教师的课堂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加强教师的精力投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如此,方能消灭“水课”,锻造“金课”,使保障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落到实处。

## 如何看待本科教育：专家与学生的视角

陆根书

### 一、回归本科教育、注重提升质量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英等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几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由数量、规模扩展转向强调质量、内涵发展。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将本科教育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将培养一流本科生作为学校发展的坚定目标和不懈追求;二是由追求学术卓越,转向同时追求教学卓越,回归育人为本;三是在关注质量提升时,由强调教师的“教”转向强调学生的“学”。

一些国家为了纠正大学重研究轻教学的倾向,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例如,英国在高等教育绿皮书《实现我们的潜能:教学卓越、社会流动和学生选择》中阐述了开发“教学卓越框架”的初步构想,并在高等教育白皮书中正式提出卓越教学框架,围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英国的卓越教学框架强调本科教学的多样性、差异

性、综合性,围绕教学质量、学习环境和学生学业成就三个核心要素对本科教学质量进行评估。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要求重视本科教育和质量保障问题,并为此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例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教育部自1994年开始相继开展了合格评估、优秀评估、随机性水平评估,并在2004年将这三种方案合并为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强调建立健全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为主要内容的“五位一体”的教学评估制度。此外,我国也推出并实施了相应的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工程。在2018年6月召开的新时代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更明确强调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本科教育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

作者简介:陆根书(1966-),男,江苏溧阳人,教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大学生学习理论研究;西安,710049。



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但高校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还不能完全回应社会的期待。首先是理念滞后。人才培养虽然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是高校之所以成为高校的重要基础和底板,但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还不够巩固,人才培养这块底板还不够厚实。“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尚未根本扭转。其次是投入不到位。领导精力、教师精力、学生精力、资源投入在人才培养方面尚未完全到位。因此,回归本科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任务仍任重道远。

## 二、评估专家眼中的本科教育

对当前的本科教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下面从两个视角进行讨论,一是专家的视角,二是学生的视角。

2018年上半年,为了对近年来在普通高校开展的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进行总结,我们接受教育部评估中心委托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个任务是对318所参评高校(其中“双一流”高校80所,地方高水平建设大学143所,普通高校95所)的专家组评估意见进行分析,从中了解评估专家组是如何看待我国高校的本科教育及其质量的。我们围绕“6+1”的审核评估范围进行分析,以了解专家组肯定了各学校本科教育的哪些方面,哪些还需要持续改进。

从定位和目标看,专家组对学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肯定比例较高,但无论是哪一类高校,都存在办学定位不明确的问题。专家组认为45%以上的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专家组对高校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肯定略低,对其中51.25%的“双一流”大学、37.25%的高水平建设大学和24.21%的普通高校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从师资队伍看,专家组对80%以上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给予了肯定,但认为88.75%的“双一流”大学、94.41%的高水平建设大学和96.84%的普通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专家组对不同类型高校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教师教学投入、教师发展与服务的肯定比例相对较

低,认为学校在促进教师的教育和学术发展上投入不足,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从教学资源看,专家组认为高校基础教学设施不够完善,课程资源不足,给予学生的选择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加强教学设施、课程资源建设力度,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

在培养过程方面,专家组对高校教学改革的肯定比例较高,但对课堂教学的肯定比例较低,对课堂教学、生师互动、课程内容组织、学业挑战性等方面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在学生发展方面,专家组对学校就业和发展维度的工作肯定较多,但认为高校对学生指导不够,没有建立有效的机制促进学生参与学习,缺乏促进学生发展的组织保障,建议高校应该加强学生指导和服务方面的工作。审核评估强调学生中心理念,但如何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是高校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质量保障方面,专家组虽然肯定了学校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成绩,但认为75%以上的不同类型高校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专家组对学校在质量监控、质量信息及利用、质量改进方面的肯定比例较低,认为这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自选特色项目方面,专家组肯定学校自选特色项目的比例不高,不足35%。这说明学校走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路仍然很长,需要进一步加强。

## 三、学生眼中的本科教育

我们主要利用对2017年陕西高校本科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对陕西高校2017届173 108名本科毕业生进行了调查,其中43 084人回答了问卷,有效回收率24.89%),从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的维度看学生眼中的本科教育。调查问卷包括清晰的目标与标准、良好教学、动机激发、基本技能、独立自主性、学习共同体、学习资源、适当的负担、适当的评价、学生支持、毕业质量等维度,以及学生对教学质量的满意度、总体满意度等内容。因素分析、效标关联效度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这一调查工具结构清晰、信效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科学、可信的工具,对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进行测量。调查结

果表明：

在课程学习经历的所有维度中，学生对独立自主性、适当的负担、适当的评价等维度的评价较低，对其他维度的评价较好。我们在理念上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或自我管理能力，但在教育实践中还没有对学生独立自主性培养给予足够重视，学业负担与挑战不足，评价不恰当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与类别高校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也存在差异。按照13个学科门类分，不同学科门类学生感知到的课程学习经历存在明显差异；陕西“双一流”高校和普通高校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在基本技能培养、强调独立自主性、学习资源、适当的评价、学生支持、毕业质量等维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公办高校学生的课程学习经历在所有维度上都要显著好于民办高校。

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对其就业满意度、专业匹配度具有重要影响。为探究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对就业满意度、专业匹配度的影响，在控制性别、学科、学校类型等因素后，以课堂学习经历为自变量，就业满意度、专业匹配度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中的一些重要维度对其就业满意度和专业匹配度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学生的课程学习经历不同，可能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

#### 四、小结与讨论

以上从专家和学生的视角对本科教育进行了审视。从评估专家组的审核评估意见可以看出，“双一流”高校未必就一定会有一流的本科教育。因此，把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加大其权重，对本科教育发展具有意义。不同层次高校应该有更明确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各类高校要提升教师发展与服务水平，增加教师教学投入；要增加教学经费投入，持续改善教学设施，优化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丰富课程资源；要深化教学改革，推进课程革命，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要强化学生指导与服务，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要进一步加强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要采取有力举措促进本科教育特色发展。

此外，对课程学习经历调查工具进行的分析表明，该工具是评价高校教学效能的一个适用工具，它能够对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有效、可靠、可信的反馈。如果能够持续收集学生课程学习经历方面的数据，将有助于对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变化趋势进行跟踪监测，为我们了解高校本科教育存在哪些优势和劣势提供可靠的指标。学生课程经历也为比较不同学校、专业的教学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当然，对这种比较需要持谨慎态度，因为影响不同学校、专业教学质量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

## 以OBE理念推进高校专业教育质量提升

张男星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建设已经从战略战术上进入了聚焦“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乃至“一流课堂”的深度。专业教育质量成为提升本科教育水平和高质量课堂教学建设之间最为重要的转化环节。而围绕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大纲等内容以及高校教师的专业化教育教学能力，则是专业教育质量提升的两个关键和难点。以何种理念

来推动和突破这两个关键与难点，也成为高校专业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选择。

### 一、全国调查显示的高校专业教育问题

近几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各省市教科院连续开展了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2018年开

作者简介：张男星（1967-），女，湖北松滋人，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高校发展及评价研究；北京，100088。



展的第二轮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有来自全国31省市的187所普通本科院校和169所高职院校参与。从本轮调查结果看,有三个涉及专业教育的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专业教育中的“双不足现象”悄然出现。本轮调查显示,涉及高校课程内容的方面被列入大学生特别不满意的范围,特别是高校课程的前沿性和实践性不足的状况是学生尤为不满意的地方。这一点在雇主调查中也得到相应的印证:80%的雇主认为本科生所学知识远离先进的生产实践,且实习质量不高。调查中显示的高等教育中实践性不足这一点,也一直是各界普遍意识到并予以关注的教育重点和难点。但本轮调查还同时发现,有超过50%的雇主将“理论知识不足”列为了对本科生最不满意方面的第一项。也就是说,雇主在对大学生实践能力感到不满意的同时,对大学生的理论知识储备也感到不满意。这是否显示,高等教育实践在逐渐出现一种“双不足现象”,即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理论知识的优越性也在淡化。换言之,高等教育既没有培养出实际操作能力很强的人才,也没有培养出理论功底很深厚的人才。这值得我们在推进专业教育质量提升时予以高度关注。

二是专业教育中教师专业化教学的支撑不够。从本轮调查来看,大学生与教师的人际关系被列入大学生最满意的一项,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对教师与学生的教学交流、学术交流也同样满意。40%的学生觉得教学缺乏吸引力,接近50%的学生反映与任课教师没有课外的学习交流,感叹专心教书育人的教师太少,名师授课的课程太少,学术讲座能受益的太少,参与科研学习的机会太少;老师直接念PPT的教学方式普遍存在。

三是专业教育中的学习投入与效果存在反差状况。本轮调查让学生自由填写3门自己喜欢的课程,共有1920门课程出现在学生喜欢的课程范畴,其中有12%属于公共课程。学生喜欢的公共课程中包括英语、体育、数学以及思政、计算机、创新创业、语文等课程。这说明公共课程的设置是受大学生喜欢的。但是,大学生在选择大学教育促进自己能力提升的选项中,却高度一致地将“外语能力、写作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以及“好奇心”列为了提升最弱的能力和品质,并且高校教师、雇主也高度一

致地与学生的选择相同。这反映出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喜欢程度及时间投入与相应应该取得的学习效果之间没有产生正向联系,说明高校的教育教学效果还需要大力加强。

以上三方面的调查结果,反映出高校专业教育教学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教育效果等质量,在学校内部还存在专业目标与内容、实施与规范、检查与改进等方面的一致性设计与执行等问题。

## 二、OBE:高校专业教育质量提升的理念选择

随着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深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要从宏观层面办学水平的提高落到中观层面学科的发展,进而再落到专业、课程和课堂等微观层面的质量建设,也即要切实落实到与学生最为接近的层面上去行动与推进。专业教育质量成为其中最为迫切和最为直接的环节。一方面,作为国家战略,专业教育质量及其建设需要一种符合国际趋势、符合国家发展的理念予以推进;另一方面,作为多特色、多差异高校彼此互动的依据,专业教育质量及其建设又需要一种能够被国际国内高校相对普遍认同的理念来规范与实践。鉴于此,基于“学生为本、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OBE理念应该可以成为推动高校专业教育质量提升的思想、制度和文化力量。

第一,OBE理念是推动高校专业教育质量提升的思想力量。OBE理念深刻地体现着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思想。在OBE理念中,学生应学到什么以及他是否已学到应学的,是整个专业教育教学中必须自始至终关注的问题。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到课程大纲设计,再到课堂教学,再到教学评价,专业教育教学始终处于依据学生需求和状态来确立与完善专业教学目标,以及实现和如何有效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之中。教师采用OBE理念教学就必须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如:是否在以学生为中心?怎么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如何能证明是在以学生为中心?这些从学生角度的追问,迫使教师不断地去思考自己所教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是否符合学生、满足学生、促进学生,并不断地去加强所教课程与学生的关系,从而避免出现调查中师

生教学交流和学术交流缺乏的现象。当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有效贯穿到教育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而不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时，专业教育理念才真正具有了思想引导实践的力量。

第二，OBE理念可以转化为高校专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制度力量。OBE理念强调以成果导向来设计教育教学，以持续改进来推进教育教学，并以基础性的标准来要求、规范、检查教育教学。成果导向并不是不强调教师的投入，相反地是更加从投入成效来强化投入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依据投入成效来改进投入方式和过程。教育教学过程需要教师的精力投入、教学资源的投入等多种投入的综合，但这些投入不是散养式存在和无方向流动，而必须用学生的成果收获来反观和检审投入，包括检查学生应该获得怎样的专业学习成果，如何让学生获得这些成果，如何证明学生已经获得这些成果，如何改进教学让学生有效获得这些成果，等等。而且，这种改进不是一次性的，它是被要求不断改进并持续伴随教学过程，最终实现所制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以避免出现调查中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偏差以及不合规现象。这种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指向与要求，将形成推进专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制度力量，自始至终地规范着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而成为高校教师专业化教育教学能力提升的动力。

第三，OBE理念可以演进为高校专业建设的文化力量。OBE理念强调专业教育教学中各种关系支撑与支撑证明。其理念下的专业教育教学，能够强化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的关系、专业课和公共课的关系、课程与课堂的关系、教学与评价的关系等各种关系之间的互相支撑，而且这种关系支撑不只是落到文字上的设计，而是落在教学过程之中的证明。OBE理念要求专业课教师和公共课教师都要持续观察：培养目标是否支撑了学生需求以及整个社会需求，毕业要求是否支撑了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是

否支撑了毕业要求，课程教学安排是否支撑了课程设计，并通过一系列反馈来检验教学环节和要素之间的彼此支撑程度与效果。因而，OBE理念下的专业教育教学从理论设计到实施过程，都一致化地强调教育教学过程多种关系的互相关照与支撑，以及支撑证明与支撑效果的证明。这种彼此支撑与证明的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不再只是“教”和“学”的线性逻辑，而是“教与教”“教与学”“学与学”“学与评”之间彼此循环证明的关系逻辑。在这种关系逻辑下，所有的课程及其课堂教学都是相连的，所有的课程教师都担负起了共同实现专业教育目标的责任，包括公共课教师。这就会推动课程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学生与学生的交流，进而避免调查中反映的师生缺乏教学和学术交流的现象。这种制度化、自觉化的课程关系，必然会突破专业教育教学中单课程、单课堂的自我封闭，从强化关系、关联的角度促使高校教师在公开和开放的状态下，去主动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产生教育教学投入与教学效果的正比态。当一所学校大部分教师乃至所有教师都持有这样的专业教育理念和课程关系认知，就会持续生发出一种集体力量，并演进为一种专业建设文化，以不断突破自我的勇气去推动专业教育质量在探索与创新中持续提升，实现学生“人人都能成功”的专业教育成果。

当前，国家正在实行专业认证制度，依循专业认证推动专业的质量建设，以此来要求高校的专业建设在一定标准下“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而无论是《华盛顿协议》还是《悉尼协议》以及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所秉持的基本理念都是或含有OBE理念。因此，以OBE理念以及该理念支持下的专业认证规范来推进高校专业教育质量提升，对破解我国高校中存在的教育教学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质量“四维”评价

洪艺敏

“以学生为中心”是一种教育理念,最早由进步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20世纪初提出。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学习理论。20世纪后半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以学生为中心”再次被重视,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与改革的方向。

“以学生为中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以学生为中心”是指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教育要以学生的成长、成才为中心,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人,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开展实践活动的人。狭义的“以学生为中心”是指一种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它有三个基本特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知识的发现者和建构者。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掌控自己的学习,制定自己的学习路径,每个学生都是自我发展的设计者。“以学生为中心”,既是教育理论,又是教育实践模式,它包含全面性的教学目标,主动性的学生角色,生成性的教学过程,科学的管理与评价。

教育质量标准是人们所赖以考察和评价教育质量的一系列相关具体准则。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是用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好坏以及满足个人、群众和社会需求程度的相关准则。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是关于本科教学活动和活动的结果并反映了本科教学质量的指标和参数的规范性文件,它包括“教”的质量标准和“学”的质量标准。“教”的质量标准是对教师“教”的规范要求,“学”的质量标准是学生“学”的应然要求。教师“教”的质量要通过学生“学”的质量来体现,学生“学”的质量是教学质量标准的核心。“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应该从学生“学”的维度去设立,通过学生的“学”的投入、“学”的过程

及“学”的产出来衡量教学质量的高低。

影响学生“学”的质量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时间投入、学习能力;客观因素包括教师的教学水平、学校的学习条件、环境、管理和服务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应该从以上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去设立标准,具体可以从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度、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度、学校对学生学习的支持度和学生的学习获得度等四个维度去设定。

第一个维度,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度。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度反映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学习态度、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程度。学习投入度可以从学生的有效学习活动包括课堂学习、课外活动、师生互动和同伴互动等方面去衡量。

课堂学习主要指学生在各门课程学习中的努力程度,包括课前准备情况、参与课堂讨论情况、查阅资料自主学习情况、作业完成情况等;课外活动主要指学生参与各类学术活动、使用图书馆情况、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和各种社团活动,参与文艺和体育活动等;师生互动主要指学生在课上、课下主动与教师交流,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与教师分享在学习生活中的乐趣、人生规划等;同伴互动主要包括课内和同学讨论学术问题,合作完成项目,课外和同学结伴学习,参加课外活动,分享学习和生活的感受等。

第二个维度,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度。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领者,对学生的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去衡量:一是教师是否能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二是教师是否敬业勤勉,是否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三是教师是否能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挖掘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四是教师是否能帮助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否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

作者简介:洪艺敏(1964-),女,福建龙海人,教育学博士,三亚学院副校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教育教学管理研究;三亚,572022。



生发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五是教师是否采用合作、对话、探究等方法鼓励学生去发现和探究；六是教师在教学中能否与学生有效互动，与学生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关系；七是教师是否能关注学生，促进学生进行学习反思，帮助学生不断改善学习；八是教师能否满足学生在学习上的需求，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做到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从教学中受益。

第三个维度，学校对学生的支持度。学校对学生学习的支持度包括学校所提供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服务。学校的学习资源包括学校所开设的专业、所提供的课程和教学设施；学习服务包括学校的学生管理制度、管理方式和学习生活的服务与管理。学校对学生的支持度可以从以下方面去考量：一是学校所设置的专业是否适应社会需求、是否符合学科发展要求、是否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二是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是否能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有所发展，课程是否丰富并足以满足学生选课的要求；三是学校的教学设施是否能满足教学的需求，是否有利于师生互动，是否方便学生的学习；四是学校的学籍管理制度是否具有弹性、是否提供给学生选择的机会和空间；五是学校学生管理方式是否有利于促进学生自律、是否有利于促进学生交流和相互学习；六是学校是否能有效地提供学业指导和就业指导；七是学校是否为学生

提供舒适、干净、安全、卫生、便宜的食宿条件和环境，是否提供给学生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

第四个维度，学生的学习获得度。学生学习获得度反映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效。学生学习获得度是学校教学质量的体现。学生的学习获得度可以从学生在学期间课程学习成绩、就业后对社会的需求满足程度和学生个人发展等三个方面去设定。

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主体是学生，教师起着主导作用。教师与学生是人，在构建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时，需要考虑影响人的因素，考虑人的生理、心理特点，要给教师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和留下灵活的空间；教学质量最终要沉淀为学生素质的提升，而素质的高低有些是能量化的，有些是不能量化的。因此，高等学校在制定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时，既要有定量的指标，也要有定性的指标，要做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教学质量有阶段性的质量，也有长期性的质量。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周期较长，长期性的质量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才能得以体现。因此，高等学校在制定教学质量标准时，既需要制定阶段性的教学质量标准，也需要有长期性的教学质量标准。阶段性的教学质量标准主要从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教学环节和学习结果去制定，而长期性的教学质量标准要从学生就业后是否满足社会的需求及其个人发展的情况去构建。

## 高等教育质量应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

薛彦华

教育部于2016年4月发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以下简称《质量报告》)，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质量报告》从社会需求适应度、培养目标达成度、质量保障有效度、办学资源支撑度、学生及用户满意度等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多维的评价。

《质量报告》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分层分类培养多样化人才等方

面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也显示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软实力”显著增强，特色发展势头强劲；质量的“硬指标”高速增长，部分“985”大学硬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以外促内、公共治理”的质量保障体系。

但《质量报告》也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仍存在学科专业设置结构优化不够、创新人才

作者简介：薛彦华(1964-)，女，山东德州人，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石家庄，050024。

培养力度不够、高水平教师和创新团队数量不够、质量意识形成和质量文化建设速度不快、专业与就业对口率不高等问题。由此,在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务必深刻反思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

当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内在距离越来越近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定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产生密切联系。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设计、统筹高等教育发展的运行模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仅从《质量报告》中社会需求适应度、培养目标达成度、办学资源支撑度三个维度的高等教育发展数据来看,就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社会需求的适应度:人才数量充足、类型多样。2015年在校生规模达3 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 852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并适度超前。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步调保持协调。新建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对接更加紧密。

培养目标的达成度:质量的“软实力”显著增强,特色发展势头强劲。按社会需求的多类型人才(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培养体系已见雏形,“高等学校正在朝着各安其位、各显其能、特色发展、争创一流的方向发展”。高校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85%以上的科研成果集中在高校,在国家自然科学“三大奖项”中高校获奖数量占据三分之二以上,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提高,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贡献度显著提升。

办学资源支撑度:质量的“硬指标”高速增长,部分“985”大学硬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中国高等教育“硬件”建设在数量上呈井喷式增长,各级各类高校面貌焕然一新。2013年与2003年相比,全国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增加了3.6倍,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增加了4.9倍,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支出增加了1.7倍。从2010年到2014年,全国高校固定资产总值增加了42.15%,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增加了57%;十多年来,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数增加2倍多,而且超过半数以上的专任教师具有研究生学位,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到专任教师总数的三分

之二,他们将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坚力量。

我们在《质量报告》中看到的质量的最终成果,但在高等教育质量目标的达成过程中均需各级各类高校在实践中去落实。然而,在现实高校内部的质量保障与监控过程中,过于关注外在指标的落实,忽略个体差异及人的主体性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高校内部的质量保障体系中弘扬价值理性的追求是必要的。

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去思考,高等教育质量应体现在学生和教师的发展上。换言之,就是在高深学问的传递与研究中,师生应获得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注个体成长中的智力、体力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关注人审美情趣的养成,关注人高尚道德品质的形成,应成为高等教育质量的终极价值追求。

但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评价多方利益主体的介入,使原本应该得以凸显高等教育利益主体地位的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反倒成了高等教育质量表达的弱势群体。在人们追求高等教育国家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师生发展需求往往受到了遮蔽。他们被各类具体的“指标”“数据”所绑架,尤其是教师,被年终考核、职称评定、各类人才项目的评审所束缚,致使他们失去了最本真的教学与科研的热情,甚至失去了应有的个人生活,自然难以激发他们教学科研的创新动力。

基于现实世界的理想才能得以实现。高等教育应将人的发展置于现实社会提供可能性的基础上去设计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以使社会需求与个人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人是高等教育的对象,也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国家和社会不能只把人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还要充分重视人的意义与价值。因此,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观取向应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状态。其具体实现路径:

其一,高等教育的目标管理应与高校的过程管理相统一。目标能否实现,过程起着决定作用。没有高校管理过程中对人的价值尊重、对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发挥,高等教育也难以追求到高质量的可观测、可量化、可观察的指标,就如同一个对创作意义没有深刻了解、对写作过程的审美情趣没有体验的人,是难以创作出高水平的文艺作品一样的道理。因此,在过程管理中要充分重视人可持续发展需要

的满足。要关注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及知识获取方式对提升其认知能力、思维能力、想象力的作用,要关注学生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学生价值观的正确性。对教师则需要考虑教学、科研的自觉性与自主性,身心发展的和谐性,同时还要兼顾教师职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完美结合。在过程管理中也要观照不同类型不同区域高校发展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充分发挥各级各类高校办学的积极性,不以“双一流”论英雄,而以培养人才的质量及对区域社会发展的贡献来评价它的质量。

其二,要建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承载育人任务的高校要积极营造培养高质量人的“育人文化”氛围,一切活动均要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要避免将高校办成职业训练所。“以人为本”应成为高校多方利益主体的价值追求,才能构建理想的质量文化。作为高校的领导者,需围绕着师生的发展进行决策;作为管理人员,需为师生的发展做好服务。如此,师生则能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

## 高校教师评价标准化的问题及反思

操太圣

有新闻报道:某教师在课堂上玩了20分钟手机,不仅毫无愧色,反而言之凿凿地跟学生说,给他们上课是浪费时间,要是到校外上课可以挣多少钱云云。这位教师的教学表现的确非常糟糕,对待学生的态度可以用“令人发指”来形容。不过,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习惯性行为的养成绝不仅仅是其本性使然,更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其生存其间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密切相关。当然,体制塑造教师行为又是通过教师个体对外在要求的内化和强化而实现的。本文关于高校教师评价标准化的讨论正是基于此展开的。

放眼全球,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率先出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给包括高等教育管理在内的公共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高校教师评价也出现了新的理念、手段和模式。新公共管理有两个基本原则:市场机制优先和绩效优先。其中绩效优先原则强调最终做成了什么,而不是如何去做。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对绩效的强调程度丝毫不弱于国外同行,无论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还是现在的“双一流”建设规划的相关政策文本,里面都明确提出了“以绩效为杠杆”的基本原则。

于是,在对高校及其教师进行管理过程中,绩效评价和绩效管理就成为必然。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本质特征,我们可以将“绩效”与“问责”这两个联系密切的概念放在一起审视。“绩效”的英文单词为“performance”,本意是行为表现、表演,即把要实现的目标、要做的事情转化成一系列可表现、可被观察的行为,以方便后续利用评估的手段对其进行测量,最终用具体数字来指称其结果(得多少分)。“问责”的英文是“accountability”,它是由“accountable”派生出的词,“accountable”意思是“可计算的”“可度量的”。因此,问责的实现与过程监控都是以可测量的行为表现为基础的。

对这两个概念内在属性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在《教育部关于完善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教政法〔2018〕17号)中获得清晰的解释。该文件指出,“标准是可量化、可监督、可比较的规范,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工具,是衡量工作质量、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尺度,是一种具有基础性、通用性的语言。”这个概念界定得非常清楚而准确,“标准化”最本质的意义是确立“规范”,要求所有相关人都必须去遵守;该规范不是笼而统之的描述,而是具体可操作的,具有“可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教师绩效评价对大学教师发展的效应研究”(15JYB006)。

作者简介:操太圣(1971-),男,安徽金寨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教育政策、学校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南京,210093。



量化”“可监督”“可比较”等三个特点。

目前,我国正通过一系列教育政策去推行和加强教育的标准化,对高校教师的评价走的也是绩效管理的路。虽然也有文件提出,要根据学校类型和教师工作重心的不同采取教师分类分层评估,要根据高校教师工作的性质采取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评价,但问题在于,高校教师的工作本身已经很复杂,欲对其分类分层实施评价,涉及到的因素就更难以操控。其结果,本着“可量化”“可监督”“可比较”的“标准”选择相关行为指标、确定简单易行的评价方式,似乎更为顺理成章。

在这里,评价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管理手段,而成为了一种治理教育的“权力机制”,对高校教师群体影响深远。所谓“权力机制”,是说评价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有效地对教师行为产生影响的流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环节:(1)设立标准;(2)用标准对教师的教育活动进行规范化裁决;(3)裁决结果以排行榜的形式公布;(4)依据评估结果对教师进行奖惩;(5)定期检查;(6)教师形成自觉<sup>[1]</sup>。在此权力机制作用下,高校及其教师会自觉地对标准,进而根据标准自我评估,最终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作为“权力机制”,教师评价不再是孤立的管理手段,而是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它让任何教师都无法从其巨大的管理体制中逃脱。为何一些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在科研中喜欢简单重复而非创新?就是因为简单重复比创新更容易出科研“产量”,科研比教学更容易出“成果”。制度对个体的强大导向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教师通常被视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可根据其自身专业的判断自主地从事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但是,在对于教师评价的过强权力机制下,教师只需秉持“达标”思维、完成指标体系中所规定的要求就可以了,结果导致了“教师的去专业化”现象。

具体来说,当前的教师评价模式对教师产生了如下影响:首先,在行为上,教师会按照评估指标来确定和规范自身的行为,规定了的就做,没有规定的就不一定做;其次,在观念上,教师会慢慢接受那些被选出的可测指标就代表教育的全部,而“忽视与可测量价值无直接相关的社会性的、情感性的、道德性的发展活动”<sup>[2]</sup>;再次,在心理上,教师

会产生“非赢即输”的对立观念,从以前强调“不甘落后”的主动状态变为“不敢落后”的被动状态。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废止教师评价制度,而是思考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教师评价的负面功能,最大化地发挥教师评价的积极功能,让评价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利器。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师评价实践中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评价模式的选择反映了人们教育观、教师观的差异,那种试图以“可量化”“可监督”和“可比较”的指标来指称教育的,恰恰表明其基于经验分析科学的认识视角。其实,除这种视角之外,还可以从突出教育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历史阐释的视角来认识,也可以从关注权力等社会机制的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来认识。应尽可能从多维度来认识教育、大学和教师,避免陷入以偏概全的评价陷阱。

第二,评价模式的选择应基于教师不同的专业水平。如果把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分成不同层级的话,那么对于那些教学质量很高、已形成自身独特教学风格的教师,就无须拿某一特定标准去评价他们,而应以欣赏的态度为其形成与提炼教育思想创设合适条件;对于新手教师来说,则要强化标准化规范的引导作用;而对于那些专业能力介于上述两类教师之间的,则要以协作的、平等的方式去与他们交流,共同决定教师评价的方式。

第三,发展性功能才是教师评价的首要目标。基于此,要与教师共同参与标准的讨论与制定;要让教师熟悉标准的内容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教学行为;应利用标准对教师教学行为进行评价(评价主体可以是同事、行政人员、督导等专业人员等);及时把评价内容反馈给教师;与教师一起制定改进计划。只有认真落实上述诸环节,才能真正发挥教师评价的发展性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该功能,还需要评价者与教师建立起信任关系,建立教师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避免教师成为被嘲笑讽刺的对象。

#### 参考文献

- [1]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93.
- [2] Stephen J. Ball. Performativity, Commodification and Commitment: An I-spy guide to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2012, 60(1): 17-28.

## 大学的压力之源是竞争而非排名

程莹

大学排名是个热门的话题。我在此将简要分析一下大学排名的源起、作用,以及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然后就大学排名给大学带来的压力提出自己的看法。

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自然产物。社会越发达,市场供给越丰富,需要做选择的场景就越多,决策也会变得越困难。排名是一种鉴别对象的工具,它通过简单的排序区分了备选对象的好坏和高低。因此,好的排名可以有效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风险。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也具有消费品的属性,而且是一种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的消费品。美欧的发达国家较早地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只要愿意,几乎人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面对数量众多的大学,大学排名作为一种帮助学生挑选高校的工具开始出现。中国本土大学排名的出现和逐渐流行也是与19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从供不应求到门槛越来越低的大趋势基本同步。

20世纪末期以来,大学排名的影响范围开始蔓延到整个社会,功能已经超越了消费者择校工具,使用对象也不再限于考生和家长。排名事关荣誉,大学排名的读者除了大学校长,还有成千上万的管理人员、教师、校友,以及大学的主管部门、合作伙伴等各类利益相关者。因此,排名经常会引发热议,媒体也抓住机会,热衷于报道排名甚至主动编制排名。这样一来,排名就对大学的社会声誉产生了影响,大学已经很难忽视排名,不主动引用报道本校排名的大学已经成了少数派。

与此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的全球化,国家之间的协作更为紧密,但是也带来“脑一手”国家的加速分化。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实力和国际分工的决定性要素。如何提高创新能力?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纷纷将希望寄托在高等教

育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成为国家的战略优先,大学的排名名次甚至上升成为国家的政策目标。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要求高等教育部设立2所法国高校进入世界前20名、10所大学进入世界百强的目标。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在2023年之前,将使至少10所日本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前100名。2012年,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计划到2025年,澳大利亚有10所大学位于世界100强之列。201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布实施“5-100计划”,致力于使至少5所俄罗斯高校在2020年之前跻身世界大学排名的百强之列。中国先后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虽然在目标表述上采用的是“世界一流”“世界一流行列”“世界一流前列”等描述性的说法,但如果缺乏其它被认可的清晰标准,大学排名仍然很有可能成为建设目标是否达成的判断依据。

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排名蓬勃发展、空前繁荣,甚至进入了政府的政策文本,但是,大学排名也面临显而易见的问题与挑战。例如,大学排名很难考虑大学的教学质量,很多排名指标存在明显的学科偏向,排名会放大学校间的差异,排名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等。

对大学排名的批评和反思伴随着大学排名的诞生延续至今,从未间断。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供给的充足甚至是局部的过剩、大学办学质量参差不齐,而对大学进行全面准确测量的难度巨大,在没有更加可靠的质量区分工具的情况下,学生、企业、政府决策者、社会对排名这种直观、易懂但是未必准确的评价信息的需求就会继续存在,大学排名因此也会长期存在。

近年来,不够完美的排名给大学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并不是源自排名,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大学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

作者简介:程莹(1979-),男,安徽金寨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从事大学评价、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上海,200240。

变。现如今,大学对争夺高分考生(优秀学生)和帽子人才(优秀教师)已经逐渐习惯,“一流”身份和政府的重点投入更是大学举全校之力要竭力争取的。然而,二十多年以前,这些今天司空见惯的现象却并不存在,对彼时的大学来说,既无对手相争,也无利益可争。有些评论将人才的“东南飞”、人文社会科学地位的削弱,乃至学校之间办学资源的巨大差距等问题都归结为排名的影响,恐怕经不起理性的分析。大学遭遇的排名压力实质上来自于大学为了获取更多资源或者维持原有资源状况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过去,大学只需要从自身职能出发,考虑如何去组织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今天,大学还需要站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从实用价值、投资回报等角度来审视、证明自身的能力,这样才能从政府和社会获取到与期望值匹配的资源。争夺资源的竞争自然不可能轻松,大学需要做出许多改变,学术自由、自主办学等固有的价值观念也

必然会受到冲击。

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竞争有可能提升整个体系的效益。美国高等教育取代欧洲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其成功经验之一即是大学之间充分而激烈的竞争。竞争会迫使学校提升管理水平和经费使用效益、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满意度,也会迫使学校关注社会需求、谋划发展战略、形成各自特色,而这些恰恰都是过去中国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所欠缺的。

总之,现时代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在为大学提供更多资源的同时,也附带了更多的期望和要求。大学应当充分理解资源持有者希望资源效益最大化和对大学办学透明度的要求,大学的发展需要在追求教育价值和满足外部需求之间达成平衡。具体到排名,大学当然不应追求排名名次,但无疑应当关注办学绩效和竞争力的提升。

(责任编辑 李震声)

(下转第122页)



(上接第20页)

## A Note on the Quality and Eval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U Da-guang HU Jian-hua LU Gen-shu ZHANG Nan-xing HONG Yi-min XUE Yan-hua  
CAO Tai-sheng CHENG Ying

**Abstract:**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trend of the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The excellence of a univers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internal management.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mainly use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pproach of "work points".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work points" deviates from academic culture, academic values, and academic concept of promoting development. It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confusion of university value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experts' reviews that "double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may not necessarily hav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should have a clearer orient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strong structure of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pursue the combination of instrumental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professional quality has become the most urgent and direct link.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problem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phenomenon of "double deficiencies"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which higher education does not have trained talents with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and deep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suppor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teaching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i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investment in learning and the effect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its construction require a universally recognized concept to regulate and practice. The OBE concept of "student-oriented, achievement-orient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an become the ideolog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orce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essential logic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quality of university must refl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at is to say,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research of advanced knowled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maxim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quiremen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outshined in pursu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reasonable scientific evaluation criteria is mandatory.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teachers should follow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the choice of evaluation model should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of common views on education and teacher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levels of teachers; and the development role remains the primary goal of teacher evalu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training,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quality standard for undergraduate teaching. The quality standards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hould focus on four dimensions: students' input in learning, teachers' influence on students' learning, school's support for students' learn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quisition. A close attention to students' behavior in classroom is compulsory. The choice of students' seat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nd non-classroom behavior affect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he quality assurance and evalu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requires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stakeholders, among which university rank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evaluation. University ranking is the natural product of popularity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erfect ranking has put considerable pressure on universities, but this pressure does not come from ranking, but in essence comes from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that universities face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resources or maintain the status of their original resources. Obviously, universities should not pursue ranking, but they should undoubted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chool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evalua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ork points; teacher assessment;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tudent-centered; university ranking